诗探索

2005年第三辑（理论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诗探索

Poetry Exploration

责任编辑:邓淑杰
曾艳纯
封面设计:高　平

ISBN 7-5387-2050-2



207

ISBN 7-5387-2050-2
定价：18.0

诗探索 (理论卷)

Poetry Exploration

2005 年第 3 辑 总第 59 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2005年.第3辑：理论卷/吴思敬 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12
ISBN 7-5387-2050-2

Ⅰ.诗… Ⅱ.吴… Ⅲ.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Ⅳ.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5947号

诗探索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5638648　发行科：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长春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MU LU

▶中国新诗一百年

1 回望百年／谢 冕
——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29 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三个发展阶段／王光明

39 史诗情结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麦 芒

71 在“后现代”用古典理论看新诗／黄维樑

84 忧思与希冀／张桃洲
——“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国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

96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沈 奇
——关于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几点思考

103 撰写新诗史的“多难”问题／陈仲义
——兼及撰写中的“个人眼光”

▶诗坛态势剖析

115 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陈 超
——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

124 当代中国诗歌：“爱”与游戏之间／刘 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134 给“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的贺信 / 贺敬之

137 一个诗歌同行的祝贺 / 邵燕祥

140 理性思维的诗化境界 / 袁忠岳

147 熔铸的执着 / 张立群
——论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

157 不屈的意志 不懈的追求 / 刘士杰
——访老诗人绿原先生

167 答谢词 / 绿 原

▶结识一位诗人

169 阳飏诗歌简论 / 唐 欣

174 阳飏诗二首赏析 / 古 马

177 把灯点亮 / 阳 飏

▶女性诗歌研究

183 她们：超越性别的写作 / 蓝 蓝

200 并非“补充”与“界限”，只是“生命”与“生存” / 慕芳
——浅论娜夜的诗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

211 智者乐水：“字思维”与原始思维的诗性感悟 / 魏家川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216 在探询中展开的起点 / 霍俊明
——读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诗坛忆旧

224 三十风雨话“朦胧” / 刘景荣

▶外国诗论译丛

233 “你，此刻，在行动”：奥尔森的《人类宇宙》/ 黄宗英

238 人类宇宙 / [美]查尔斯·奥尔森 孟亮 译 黄宗英 审校

回望百年

——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谢 冕

一

1899 年的最后几天，梁启超在流亡东土一年之后，舟发横滨，赴夏威夷考察。在经历风浪颠簸之苦中，想起的第一件事，是中国的诗歌。这一年 12 月 25 日，梁启超在太平洋舟中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如下的一些话：

> 余素不能诗，所记诵古人之诗不及二百首，生平所为诗不及五十首。今次忽发异兴，两日内成十余首，可谓怪事！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

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①

梁启超提出了他所理想的新诗歌的几个条件，并殷切地期待着“欧洲真精神、真思想”成为建立中国新诗歌的“诗料”：

> 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②

梁启超在戊戌变后的流亡途中，依旧不忘于中国的政局，其中突出地包含了对于中国诗歌命运的牵挂。他在旅途中对于未来诗歌的祝愿，距今一百多年后读之依然十分感人。他寄希望于诗歌“新大陆”的发现，更对创立中国新诗歌的哥伦布、麦哲伦式的领航人物怀有热切的期待。在这篇日记中，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除了一般的号召之外，他具体地提出了诗歌改革的三个条件：第一是新意境，第二是新语句，第三是“以古人风格入之”。前两个条件包含了对引进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后一个条件则包含了对于保存传统风格的愿望。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蓝图，是在保存“旧诗”的大前提下对诗歌进行改革的设想，与后来的五四新诗革命虽是同向的，却有大的差别。

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他重申“诗界革命”这一理念。作于1901年的《广诗中八贤歌》中有这样的诗句：“诗界革命谁欤豪？

---

①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第1826－182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本文分别发表于1900年2月10、20日，《清议报》第35、36册。

因明巨子天所骄。驱使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①] 他诗中所咏的诗人有章炳麟、陈三立、严复等，显然代表了梁启超心目中的诗歌形象，也寄托着他的诗歌理想。这些，同样与后来发生的诗歌变革也存在着差距。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在当日显然无法想象后来在中国上空刮起的诗歌风暴的凶猛与激烈的程度。

许多诗歌史家都注意到近代以来比梁启超更早的一些诗歌变革的理想，以及那些跨出旧藩篱的大胆实践。特别是黄遵宪的诗歌主张及其创作。黄遵宪被公认为诗界维新的先行者。早在清同治年间，当时年方二十一二岁的黄遵宪就在《杂感》诗中，对中国诗歌的传统与现状发出深刻的质疑：

>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流离，高炉热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②]

他从时代变迁、新陈代谢的道理来看诗歌的演变。他的“别创诗界”的诗歌理想，是与他的政治、学术上的改良维新思想相一致的。他主张立足于现代，不墨守成规，更不盲目师古，相信今天我们的所为，也可成为他日的经典。“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一道骇世惊俗的改革诗歌的宣言。这种重视当世、相信今我而不迷信古人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转折时期的先进思潮。“吾人生于今日，当世界交通之会，所见所闻，自较前人为广。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③]

---

① 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见《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第3735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本诗发表于1902年3月10日《新民》第三号。

② 录自《人境庐诗草》卷一。

③ 吴沃尧：《杂说》。见《月月小说》第八号。

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具有前卫的性质。他的组诗《今别离》把现代交通通讯的先进技术写进诗中。他还从山歌民谣中吸取诗的养分，组诗《山歌》其实就是他所记述加工的民间诗歌。[①] 他一面进行诗歌的改革试验，一面又在理论上完善他的未来诗歌的设想：

> 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②]

在谈到他心目中的“诗境”的同时，他还对未来诗歌的取材、述事、炼格都作了预设。他提出要“不名一格，不专一体”，主张“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他的目标是，要创造出“足以自立”的“不失乎为我之诗”。这些主张，已经显出了后来新诗革命中的争取独立精神的雏形。

从黄遵宪的立论和实践可以看出，他和梁启超一样，是以不丢弃旧诗传统框架的前提下，进行诗歌改良的。诗界革命的设想存在着大的历史局限性，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它的未能取得成功是必然的。钱仲联对此有过评价：“诗界革命从总体上说终究没有能从根本上摆脱旧体诗的束缚，只能在旧体诗的规格内创新。因此，诗界革命也如绚烂的晚霞，很快就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如此，他们

---

① 《山歌》诗前有序：“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1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

留下的诗篇和取得的成就，足以突过元明以来的诗坛，成为几千年中国古典诗歌的后劲，他们在诗歌通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为五四运动后掀起的白话诗架起了桥梁。”①

二

桥梁的作用是通往彼岸。此岸是出发点，而到达则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对于此岸而言，作为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创立与试验，不能无视和越过近代诗界维新运动的实践的意义。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之父。同样，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要是没有近代诗界维新的大胆的设想和那些不免稚嫩生涩的实践——这些实践的基本的和最高的形态，是“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② ——也就不会有后来轰轰烈烈的新诗革命。但他们的主张是以不打破旧框架为前提，只是力求在旧体式中充填新名词和新思想，从而难免有内容与形式不相适应的尴尬。

但当日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即均立志于诗的内容的革新。他们希望中的诗歌，是能够承载新思想、新精神的一种媒介。他们共同寄大希望于新诗歌。胡适认为历来的文学革命都是事关语言文字的改革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这虽然都是文学形式上的变革，其真正目的却始终为着内容。

《文学改良刍议》③ 所列“须从八事入手”中，第一事就是“须言之有物”。所谓“物”，指的是情感和思想。胡适说，“吾所

---

① 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见《近代诗钞》（壹）第11－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版。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见《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第3791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

③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海群益书社，1917年1月1日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已。”语言文字和文体的改革，诗歌争取的“诗体大解放”，其目的在于“打破那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有了这一层“打破”和“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诗里去。”① 所以，他们的目光始终是盯着内容的革新的。

自近代以至民初，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新诗革命主张的提出及其实践，其大的背景都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积弱。列强虎视，国事无章，忧患迫使中国有识之士，四方寻求改变国运的药方。新诗革命作为新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它继承了自近代龚自珍以还的一批先觉诗人的追求和理想。其明确的目标在于以诗唤起民众的觉悟，促使社会进步，即所谓的强国新民的目的。

这些人开始想在保全旧诗格局之内，进行新思想和新精神的加入。这种努力不能奏效，诗界革命也没有留下有力的作品。但是他们更新中国诗歌的理念、以及前无古人的大胆实践的勇气，都给后来的新诗革命以启迪。新诗革命的实践，正是从诗界革命最想保全的那个地方打开缺口的。黄遵宪、梁启超等一再申明的要以“旧风格”入诗的主张，在胡适、陈独秀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从胡适的“八事”② 到陈独秀的“三大主义”③，其基本用意

---

① 胡适：《谈新诗》。本文作于1919年10月。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② 《文学改良刍议》：“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海群益书社，1917年1月1日。

③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载《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海群益书社，1917年2月1日。

都在打破古典文学和诗歌给予人精神上的桎梏。胡适在新诗试验上竭力要消除旧诗的影响，第一步就是他表述的要去掉新诗中的“旧词调”①，即要去掉旧诗的任何痕迹，以全新的姿态创造新诗。他明确主张“不但要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② 他的这些想法，早在美国时与友人交换意见中，就有所表达。当时他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使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③

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极端说法引起人们的质疑。他的初衷在于要急切地脱出旧诗的俗套，使新的诗歌能够直接地、无障碍地容纳新思想和新内容。只要有了这些，诗不诗的，就无所谓了。这种想法，不仅是胡适有，与他持同样主张的同时代人大体都有。钱玄同就说过，“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④ 在他们的心目中，有比诗文本身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迅疾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借以唤起民众，振兴社会。

当时很流行这样的说法，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不仅是作诗如作文，而且，只要有新内容，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所以，就新文学而言，当时注重的是“新”，而忽视的是文学；就白话诗而言，当时注重的是“白话”，而忽视的是诗。在新诗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初期的关注集中在承载，而忽视了诗学和诗性本身，导致初期白话诗一方面由于缺乏节制的“解放”，使艺术失去准则，无

---

① 胡适在《谈新诗》中有数处说到“旧词调”：“我自己的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

② 胡适：《谈新诗》。本文作于1919年10月。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③ 《尝试集——自序》，见《胡适文存》卷一，第267－26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10月。

④ 钱玄同：《尝试集——序》。见《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上海群益书社，1918年2月15日。本文作于1918年1月10日。

所约束的诗生产得快，而被遗忘得也快。总的体现为艺术表现方面的粗糙和不成熟。

这样，伴随新诗的诞生而来的，那种直白、浅露、散漫、拖沓、少韵味、不蕴藉等缺陷，几乎是遍地开花地弥散开来了。总的说来，新诗建设过程中的“非诗性”的“病根”，早在它的“襁褓”期中就不幸地种下了。白话诗的这些缺陷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固然可以初创期的幼稚来为其开脱，但是不可回避的是，这原本就是一种刻意的追求。

早期新诗实践中存在的这些忽视诗的艺术特性的弊端，人们不是未有觉察。成仿吾在《诗的防御战》文中表现出对初期白话诗实践中的过于热衷于内容的充填，偏重于抽象说理，特别是对于诗的生命的情感的淡漠提出警示。他列举了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徐玉诺等人的作品为例，认为白话诗创作中缺乏诗意的症结，在于混淆了诗与文的界限。他所谓的“防御战”，意在坚守诗质——发挥情感的效果，而不在满足于用诗来“说话”或“说道理”。

> 诗的职务只在使我们兴感 to feel 而不在使我们理解 to understand。使我们理解，有更明了更自由的散文。诗的作用只在由不可捕捉的创出可捕捉的东西，于抽象的东西加以具体化而他的方法只在运用我们的想象表现我们的情感。一切因果的理论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①

尽管创造社同人后来迅速地转向了革命诗歌的倡导，他们同样走上了为革命的内容而忽视甚至牺牲诗性的道路，甚至走得比谁都远。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发表了很有力的见解。不仅成仿吾，还有郭沫若等人。

---

①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见《创造周报》第一号。泰东图书局，1923 年 5 月 13 日。

其实，还有比成仿吾更早对新诗发出警告的。就在新诗刚刚试验成型的初期，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就敏锐地指出："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他是赤裸裸的，没有固定的形式的，前边没有模范的，但是又不能胡诌的；如果当真随意乱来，还成个什么东西呢！所以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① 当新诗从无到有，终于"尝试"成功，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时一般人产生错觉，以为新诗的写作是很容易的，俞平伯揭示了新诗的"难"就在于它的"易"。

这样的局面直至一个倾全力于诗的艺术王国的建立的派别出来，方始有了一个影响全局的氛围。但那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1926 年徐志摩为晨报副刊《诗镌》创刊致辞，声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 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我们信完美的形式是完美的精神惟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②

这是新诗创立之后关于诗学的第一次正面碰撞。也是一次致力于新诗之艺术建设的有力冲刺。这些最初集结在《晨报——诗镌》的一群，后来又更大范围地集合在"新月"的周围。他们依然怀

---

①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见《新潮》第二卷第一号。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 年 10 月。

② 徐志摩：《诗刊弁言》。见《晨报副刊——诗镌》1 号，1926 年 4 月 1 日。

抱“希望为着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着时代的生命增厚一些光辉”（《“新月”的态度》）的愿望，而继续当初的努力。而这已是1928年的事情了，中国的社会情势和文学情势都已发生变化。工人运动和左翼思潮的兴起，使他们进退维谷。他们可谓是“生不逢时”。他们的工作旷日持久地被淹没在“唯美主义”、“艺术至上”的责难中。

三

回望当年，陈独秀、胡适等人充满自信，一路攻杀。他们义无返顾的决绝精神，至今尚令人为之气壮![1] 他们是无视、“踏倒”、几乎不计后果地前行，新诗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在倡导和建设白话文学的过程中，旧诗是最后、也是最难攻破的堡垒。因为站在新诗前面的，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形成的诗学传统，成就了无数杰出的诗人。古典诗歌在气象、境界、情趣、体式、韵律，乃至炼字、炼句等，举凡涉及诗歌的创作、阅读、欣赏等所有的层面，都形成了丰富而坚实的传统。它是不可逾越的伟大典范。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古典辉煌和现代诉求二者之间犹豫不决，希望有一种缓冲的妥协。他们处于两难之中。他们几乎是不战而败。事情轮到新诗革命这一边。新诗革命的先行者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敢于对伟大的传统说“不”，而且采取了大胆而决绝的“推倒”（陈独秀语）的策略。

其实，在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之前，有人已经预期到行动的艰难。梁启超在发表著名的跨世纪宣言《过渡时代论》的同时，又

---

① 这里仅举一例说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给胡适的信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年时为1917年5月。

著《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在说到十种“其性质相反，其精神相成”的德性中，就有“自由与制裁”、“破坏与成立”两项。指出“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①] 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后果的预警。但事情却不能顺利地按照人们的意愿行进。

新诗是要在传统诗歌之外寻求自由，但在实践中却疏于节制。新诗诚然是想在破坏中“成立”，但事情既已发生，一切犹如决堤之水，使“成立”不可预期。白话诗的写作因为几乎挣脱了一切的约束，如脱缰之马一路狂奔而无法止住脚步。那时人们一门心事想的是“写什么”，而极少、甚至不屑于考虑“怎么写”。不论是“白话”，不论是“新”，他们忘记的总是“诗”。

“写什么”是作品表现的内容，以及作家、作品与历史、现实的关联的问题。由此，也涉及作家的立场、态度和观念，是对于所有的文体，乃至于文艺的各种形式，均是同等重要的问题。它并不专属于某一特定的文体。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后者，即“怎么写”。对于诗而言，它涉及诗人面对他所关切的材料，如何恰当而又精到地予以诗性表达的问题。当内容一旦决定之后，艺术表现的问题就是考量和衡定作品价值的最后的条件。可是，这一极端重要的问题，却受到了忽略。

我们现在仍然感受并享受着“诗体大解放”所带来的写作上的大自由。但是退一步想，当我们只是把诗当成一种思想内容的运载工具，而很少甚至不考虑它是如何表现这些思想内容的，那么，诗又有什么意义呢？更有，这些所谓的思想内容本身，它的合理性、包容性，是否具有普泛意义等等，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由于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即使是注重写什么，本身也存在着疑点。

---

① 梁启超此文发表于《清议报》第八十二、八十四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8－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4月第一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